



光荣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

珠江风暴

內 容 說 明

本書收入了“广州起义回忆”、“奔向海陆丰”、“珠江风暴”、“海陆丰的紅旗”等四篇文章。內容是描写广州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以及广州起义失敗后一部份起义軍退到海陆丰繼續与反动軍队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

珠 江 风 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员会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字数 28,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1\frac{5}{8}$ 插頁 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90001—30,000册

統一書号: 10020·1207

定 价: (2) 0.13 元

目 次

广州起义回忆	何 潮 (1)
奔向海陆丰	徐向前 (11)
珠江风暴	陈同生 (20)
海陆丰的红旗	广州部队征稿组 (38)

广州起义回忆

何 瀚

“四·一二”之后，白色恐怖籠罩全国，斗争日益尖锐。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委员们，紧紧团结在张太雷同志的周围，转入地下，向叛变革命的反动派，积极开展斗争。

有一天，我接到一份通知，要我到停泊在珠江的邮船上去参加一个秘密而且重要的会议。我匆匆按时跑去。

那天下着牛毛细雨，江面水汽迷蒙。白鹅潭中，外国的舰船成群，游艇穿梭。就在外国浅水舰之间，有一条船的桅杆上，挂着白地蓝边上绣“邮”字的水纹旗，那就是我们约定的秘密会址。

船舱有一丈米宽，三丈多长，四周用帆布围得严严实密，只有靠船头的两扇玻璃窗透着一丝光亮。

我们三十几个人挤在船舱里，默默地吸着烟。江边上，穿黑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水上武装警察，和戴着墨镜的便衣暗探，来回巡视着。

不一会，张太雷同志走进来了，我不禁为他的安全担心，脱口说：“哎啊，你又来啦？”他轻松地笑了笑，说：“来啦，而且是平安无事。”是的，每次海员工会系统在沙

面“好蔣”洋行工人宿舍，或是輪船上開黨組會，他總是機智地擺脫敵人的跟蹤，一次無誤地平安到達開會地點。不過這幾天外面風聲太緊，不能不令人為他捏把冷汗。

他穿著一套灰色工人裝，象個洋行打字間的工人。會議開始，他站起身來，從懷里掏出一張小紙頭，低聲而又興奮地說：“同志們，告訴大家一個重要消息，黨決定在廣州發起武裝起義。”起義，奪取政權，可以說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情。大家一聽這消息，都壓低嗓子異口同聲說“好！”接著張太雷同志講了起義的意義，和對我們海員工人的要求。他講得生動有力，不時打著手勢，配戴胸前那條懷表的銀鏈，隨著手勢擺動著。

會議的氣氛嚴肅而又緊張，整整開了兩個小時才結束，同志們興沖沖地陸陸續續離開郵船。

不久，“起義行動委員會”產生了，張太雷同志是總指揮，譚代英、楊殷等六、七人分任其他職務。

起義前，“行動委員會”在我家開會，布置起義。會前，我照例布置我母親和岳母到廚房談家常，監視對面的茶樓，叫我愛人在三樓做針綫活，注意街道附近的動靜。

早飯後，張太雷同志又換上一套深灰色格布衣服來到我家。接著我們就擠在一間保姆住的小板房裡開會。

大家圍著一張廣州市區地圖，研究行動日期，調配人選，還討論了蘇維埃政權問題。行動計劃爭執很大，有人主張同時攻打沙面租界和河南的李福林反動軍隊；有的

則主張以攻市區為主。張太雷同志老是笑着，用詢問的眼光注視同志們發言，偶爾點點頭，往地圖上划着。有時誰講得興奮了，嗓門高了，他就擺擺手，示意聲音放低點。等大家充分發表了意見之後，他口角上挂着一絲微笑，心平氣靜地說：“打沙面，打李福林當然好，但要估計我們的力量，要講策略。目前，我們的力量不足，所以我同意以攻市區為主，其他地區暫時防禦……”他說得頭頭是道，清晰透徹，大家莫不佩服。難怪凡是認識他的人，一提起他的名字，都翹起大拇指說：“了不起！”

經過反復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月十三日舉行武裝起義。不料敵人發現了我們掩藏武器的米店，被抓去的老板叛變了，決定參加起義的教導團內部也有反動軍官告密。因此，廣州反動當局已經戒備起來，十日宣布特別戒嚴令，日夜不停檢查戶口，並且要調回駐韶關的軍隊來鎮壓。此外，軍閥張發奎還準備下令解散教導團。情況很緊急，為了爭取時間，不讓敵人的陰謀得逞，行動委員會當機立斷，把起義時間提前到十一日。

這天凌晨三時半，葉劍英同志領導的教導團首先誓師起義。誓師的炮聲，打破了深夜的沉寂，霎時，五、六萬工人、青年學生拿着木棍、短劍和自制手榴彈來配合行動。一時大街小巷响彻了沖殺聲和振奮人心的、嘹亮的國際歌和少年先鋒隊歌的歌聲。一下子，全市沸騰起來了。

街上到处都是我們的手車、洋务、海員、印刷、汽車、油糖、柴炭等各行各业的工人組成的赤卫队。凡参加暴动的人，頸上都围一条紅領带，或手臂上扎着紅袖标；市民都叫我們“紅带友”。沒有参加打据点的同志，都拿着枪或木棍在街头巷尾警戒。一遇見人便喝口令，答得对的可以自由通过，答得不对的，不讓乱走乱动。那天的口令是“暴动”，大家叫起来也特別有劲。

鍾华、施五郎、容灶我們几个人分头帶領工人在西壕口、长堤一带碼頭封鎖开往港、澳的“金山”、“龙山”、“广东”等輪船。我們一面劝阻旅客不要上船，一面通过在船上工作的党员，动员海員离船登岸，参加暴动。这样，旅客不上船，船又沒有人开，气得那英国老板眼巴巴地在船上来回奔跑。

当时，珠江江面有两艘海軍炮艇駛过，我們立即开枪射击，炮艇夹着尾巴逃跑了。

原定計劃，总部設在公安局，七点鐘左右，听说公安局早已攻下，我們便到总部去联络。滿街挂着紅色橫条标語。惠爱路、公园前、維新路一带，有很多“紅带友”和教导团的同志，匆匆忙忙地来回奔走。路旁坐滿了俘虏兵，摆滿了迫击炮、大炮。我心里罵道：“你这帮契弟（广州話，小舅子的意思），現在知道我們的厉害了吧！”公安局門前，那块老百姓望而生畏的招牌，已換上大紅的木匾，上面写着极其醒目的几个大字，“苏維埃政府”。噹，

这就是我們自己的政权。

张太雷同志站在門前一张长桌旁，向围着他的人布置任务。十二月的天气已經很冷了，可是他还是满头大汗，脱了外衣，只穿着白衬衣和一件淡灰色的絨綫背心，站在寒风里，左迎右顧地忙碌着。看他那嘴角上的微笑，和应付自如的沉着劲，真是個老練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这时，吳毅、周文雍、季布高和陈郁等同志也在那里，見了我們非常高兴，为我們在战斗中无任何不幸而欣慰。大家很久沒有这样公开地聚在一起了，多么令人兴奋啊，广州是人民的天下了。

他們說，起义一开始，张太雷同志就昼夜不眠，片刻不停地指揮全盤，哪里打得最激烈，他往哪里跑；哪里最困难，他往哪里奔；有时，甚至到状元府等地火綫上指揮队伍作战……。听着这些話，我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他那忙碌的身影，心里无限崇敬。

这时叶挺同志正在樓上办公室里，用紅藍鉛筆在大地图上画着，因还有很多据点沒有攻下，枪炮声仍断断续續的响。他見我跑上樓来，就說：“你来的正好，快帶一些人到东較場軍械庫去搬运武器，把外边徒手工人装备起来，去支援打据点的同志。”我赶忙跑出来，和一些工人、士兵坐上一輛卡車，奔向东較場。

搬完枪支，将近中午了。周文雍同志对那些正在編队的工友大声叫道：“誰沒有枪，拿去！”一队队工人都拥

上來領了槍，新奇地、珍惜地用手顫量着。

突然，有人跑來報告說：“薛岳部隊從總統府（中山紀念堂）方向打來了！”

未等周文雍同志下達完命令，二、三百個工友拿着槍，就和教導團的同志一起向中山公園沖去。沿街警戒的“紅帶友”一聽敵人來了，也自動加入戰鬥行列。工人們不懂戰術，見到敵人，一擁而上，有的在人群中亂放槍，把自己的人打傷了。教導團的司號員連忙大喊：“別在後面打！別在後面打！打傷自己人了！”後邊這才停止放槍。

海員黃才拿一支步槍，邊喊邊追。他扣了一下扳機，也不知他不會用，還是槍壞了，沒有响。他急了，干脆把槍扔掉，取下刺刀拿在手里，沖了上去。敵人經我們這一反擊，死傷很多，沒有死的，跪在地上舉手投降，把槍扔的到處都是。敵人被迫到觀音山（越秀山）、五層樓（鎮海樓）附近，四散逃竄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押着俘虜、扛着繳獲的槍支回來。

中途，大家順路到偽省府大院里看看。院內撒滿了紙張文件，還有不少大洋、鈔票。但是，誰也沒有去拾，都說：“這些臭鈔有什麼用！”是的，我們都這樣想：“我們勝利了，有了政權，比什麼都重要！”

回來後，吳毅同志又叫我們去沒收中央銀行西堤分行。誰知我們去晚了，那里給搞的亂七八糟，很多人還在

搬东西。我大声喝問：“你們哪里来的？”他們說：“政府派来的！”我問：“哪个政府？”他們說：“国民政府！”不听还罢，一听我就火了：“你們还不給我滾，打你这个‘契弟’！”这帮流氓在混水摸魚，見我們都挂着紅領巾，便爬窗跳楼、抱头鼠窜了。我們进去一看，什么都給搬光了，只剩下几个没办法打开的保险柜。我們只好回来将情况告訴給吳毅同志，他說：“以后再說吧！”

天将黑了，我又跑回西壕口。西堤六二三路一带大街小巷都堆滿了沙包。这是教导团的同志构筑的临时工事。他們还留下一个排和我們一起警戒。听说，他們当天打了不少仗哩！

夜里，仍很紧张，我們一直在来回巡邏。

第二天，我們的口令改为“赤化”。的确，全广州市都赤化了，都紅起来了。我一想起这个口令，就心花怒放。

早飯后，停泊在碼頭边的几条輪船，由駐在沙面的英国水兵开出海去了，工友們輕蔑地吐了吐口水，罵了两句，再也不理它了。但我們一見到炮艇（有国民党的，也有帝国主义的）經過沙面，就伏在沙包后射击。炮艇还击一陣，又象以前一样夹着尾巴跑了。

下午，我到总指揮部去联系事务，忽然一个工人同志匆匆跑来，急喘喘地說：“张太雷同志牺牲了。”他用顫抖的双手从怀里掏出张太雷同志的遺物：一只怀表、几枚双毫硬币和一些馬克紙票。他望着这些物件，眼泪盈眶，喉

头咽哽，泣不成声地说：“张太雷同志……开完群众大会从……西瓜园回来，在中华路……黄黎巷附近……被敌人暗杀了……”

我听到这个噩耗，心象被沉重的铁锤击打着，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同志们越集越多，围在一起，一声不响，眼含热泪望着那只还在嘀答走着的怀表……。

风，刮得天昏地暗，愤怒地呼啸着，象在发泄莫大的不平。

天黑下来了，同志们领受了新的任务逐渐散去。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西壕口，眼望波涛汹涌的珠江水，紧握手中武器，在西堤二马路，太平路一带巡查着。张太雷同志的音容笑貌，也象江水一样在我脑海里翻腾。

我认识张太雷同志，已经有两、三年了。在这期间，我不知听过多少次他那通俗动人的报告，读过多少篇他在我党刊物“群众”“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真象“太雷”一样震动我的心弦，鼓舞我的斗志，使我得到莫大的教益。不料，这位年轻有为的组织者、优秀的党的活动家，在这紧要的时刻牺牲了。刚才战斗中的一瞬会晤，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会面……

入夜，不时传来阵阵的枪声。半夜时分，教导团的同志撤离了那个地区。不久，有一个队员来报告说在嘉华银行楼上有人打枪，我们立即把嘉华银行包围起来。但铁闸太牢冲不进去，同志们说：“我们守住，你到总部去搬

队伍来！”

我跑去总部，天已亮了。总部門口，人迹稀少，只有几个“紅带友”在站崗，一个同志問我，“你来干什么？”我說：“搬队伍！”他說：“总部在昨夜三点鐘撤走了！”我一听楞了，問：“为什么？”他說：“总部派人通知了你們啦！”我說：“沒有遇見。現在怎么办？”他說：“情况变化，总部交代，要大家設法撤退。”

因为暴动提前了，外围各地的军队不能及时赶到，各县农民未完全按計劃赶来支援，使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战斗力减弱了。这时，敌人薛岳部队潘支的那个团，从芳村过河来了，美国战艦“沙克拉明拖”号与英国战艦“莫丽翁”号的海軍陆战队，也协同刚从外围赶来的反动军队在长堤登陆，向市区猛烈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当然，总部撤退是正确的。但現在留下的人怎么办呢？我只好根据总部的命令，跑回西壕口通知大家撤退。

我跑回家，将文件燒了，把刻蜡紙的鋼板也藏起来了。这时，从香港回来参加暴动的五、六个同志，找到了我的家。我将情况告訴了他們，要他們設法隱蔽撤退。他們离开后，我也吩咐了家里的人疏散。枪声越来越近，我急忙化装为工人，从六二三路下了小艇，登上去香港的輪船。

在船上，正好碰見施五郎同志。我們找到了在船上工作的譚六科。他叫我們把被紅領巾染紅了的脖子洗

淨，又說，“香港有很多密探，一見頸上有紅色的就抓。”我們被安置在煤倉內，裝作是他船上的工友。船到香港，果然有密探來搜查。我在倉里蓋着一床爛毯子，裝着睡覺。密探到處亂鑽，不久就走進倉里來，把我搖了幾搖。我心裡扑通扑通直跳，但还是打着呼嚕裝着熟睡的樣子。密探問船員：“他是誰？”幸得船員說，“我們的工友！”才過了這一險關。

上岸後，我回頭眺望廣州，內心的激情，長久不能平息。這次起義是失敗了，許多優秀的無產階級戰士獻出了生命。但是，最後歡笑的才是真正的勝利者，而我們一定是最後歡笑的人。

奔向海陆丰

徐向前

紅軍初創，有許許多多的部隊，是赤手空拳搞起來的。

廣州起義前的幾小時，工人赤衛隊第六聯隊秘密地集合在幾個工人的家裡，進行着起義前的緊張的戰鬥准备工作。沒有一支槍，沒有一顆手榴彈，大家圍着一張破桌子，點着油燈，看我用一支鉛筆在紙上画，怎樣利用地形，怎樣打手榴彈，怎樣冲鋒，……這真是名符其實的“紙上談兵”。我是外鄉人，廣東話說不來，有些話翻來覆去講半天，同志們還是听不懂。幸得，聯隊的黨代表是本地人，是一個精干的工人，會說普通話，一面學習軍事知識一面當翻譯。

第六聯隊的人，有許多是參加過省港罷工的。有的是黨員，有的是贊助革命的左派，他們的革命熱情很高，自從南昌起義失敗，黨就積極準備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以抗擊國民黨對工人和共產黨人的大屠殺。這時黨派我擔任工人赤衛隊第六聯隊的聯隊長，對工人進行一些秘密的軍事訓練。工人們經常在晚上分批的開會、學習，進行着緊張的秘密活動，準備武裝起義。當我們接到了上

級決定起義的命令的時候，同志們的眼里都閃着驚喜、緊張的光芒。如果不是怕走漏風聲，人們會立刻高聲呼叫起來。而當時只能低聲地紛紛說：“我們的鐵尺、斧頭、菜刀、棍子都準備好了，要再有幾枝手槍和一些炸彈就更好了！”

我們已經派人領武器去了，但是，可以想得到，武器是不會多的。同志們望着我和黨代表，而我和黨代表則相互望着。人們的眼睛象在齊聲說：“武器，武器！……”

“兄弟們！”一個曾經參加過省港罷工的老工人輕輕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鬧革命不是吃現成飯。領不來武器，我們可以奪取敵人的槍！”他的話里充滿着英雄的气概！

“對，這位同志說的對，”黨代表揮着拳頭說，“我們工人階級，從來就靠這兩隻手，沒有槍，拿菜刀、鐵尺、棍子！”

“對！就這樣！”

“我們一定要奪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工人同志們都揮揮拳頭。

我們開始研究巷戰的戰鬥動作。不多會，走進來一位年輕的、提着一只菜籃子的女同志。她包着頭，只露兩隻眼，一聲不響把菜籃子放到桌上。黨代表猛地站起，高興地說：“武器來了！”這時，那個婦女把蓋在籃子上的菜掀掉，露出兩支手槍，幾個手榴彈。大家早有了思想准

备，沒嫌少。只有一个同志問了一句，“还能多給点嗎？”

“沒有了。”那位女同志說，“暴动起来以后要多少都有。”說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滿信心的說。接着把手榴彈分給几个有經驗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訊号。

那天晚上，广州的城里格外的沉寂，大街小巷似乎格外的严肃，時間过得特別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搖搖。

“你說現在別处的情况怎么样？”他問我。

“各区的工人赤卫队都差不多集合起来了。”我說，“現在，正象被閘住的許多股洪水，只要閘門一开，就会奔流起来。”

他笑着直点头。

午夜以后，市区里响起了一陣枪声。这枪声告訴我們：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行动了。我們按照預先的战斗部署，冲出巷口，守馬路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繳了。我們得了几支长枪，不再赤手空拳，立刻把第六联队分組的大街小巷控制起来，和总指揮部取得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的、沸騰的广州城。广州苏維埃政府宣布成立了。馬路上紅旗飄揚，标語、传单貼的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紅領帶的起义軍，高唱着国

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大街小巷奔走。起义队伍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我们联队的一部奉命开到总司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到一个堆着很多缴获武器、弹药的大院里，领到了步枪、子弹，全部武装起来。这时六联队已成为一支更加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起义军已占领了广州市大部。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反动的据点公安局、军事厅、省政府等早已被我们摧毁，但仍有一些残余的据点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已从北江增援到广州，在炮舰掩护下，多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份坚守阵地，英勇还击。这天，我们联队的任务一部份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的同志们作战，一部份是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了，第二个人又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第三个人又冲了上去。我们联队的党代表，在反击观音山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的打退敌人的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这位不朽的工人阶级的战士，已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